

谭绍江 著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李翱
Li Ao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李翱

谭绍江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16N10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翱 / 谭绍江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882-2

I. ①李… II. ①谭… III. ①李翱(774—836)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1786号

李 翱 LI A0

谭绍江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特邀编辑 宋亚杰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882-2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第1章 青葱岁月 / 001

一、动荡的时代 / 001

二、望族后裔 / 009

三、应考进士 / 014

四、南下游学 / 019

第2章 宦海沉浮 / 024

一、初入官场 / 024

二、幕僚岁月 / 030

三、诤臣本色 / 038

四、迈向官场生涯顶峰 / 045

五、宦海生涯总结 / 052

第3章 师友情深 / 060

一、韩李之交：千古佳话 / 060

二、知遇之交 / 069

三、学问之交 / 076

第4章 一代文杰 / 086

一、古文创作理论 / 087

二、李翱的叙事类作品 / 095

三、李翱的抒情类作品 / 103

四、李翱的随笔杂著 / 113

第5章 复性思想 / 121

一、李翱复性思想的渊源 / 121

二、复性思想的内容（一）：性与情的关系 / 132

三、复性思想的内容（二）：“诚”之道 / 137

四、复性思想的内容（三）：灭情复性 / 142

五、复性思想的历史地位 / 145

附录

年谱 / 152

主要著作 / 154

参考书目 / 154

第 1 章

青葱岁月

任何优秀人物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人生的磨砺，任何杰出成就的取得也需要经由勤奋的累积和时间的检验。要全面认识一位优秀人物及其不凡的成就，最佳方法是沿着他成长的轨迹慢慢地了解和品析。“青葱岁月”就是一段成长轨迹最初的那个阶段，也是每个人物立下志向并积蓄最基本的人生力量的阶段。

一、动荡的时代

优秀人物的成长离不开时代的造就，他所有的成就与不足都与他所处时代密切相关。了解一个人物，就必须先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作为本书主人公，李翱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众所周知，繁盛的大唐王朝从玄宗朝的“安史之乱”开始便走向了由盛转衰的阶段。从 762 年叛乱平息至 907 年，凡一百四十五年中，充斥着宦官专权、朝臣党争、藩镇战乱等现象，整个是一个动荡时代。具体而言，李翱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敬、文七朝，其动荡的时代特点我们可以从

四个方面来了解。

混乱的政局

藩镇割据是李翱生活时代国家政治最大的混乱之源。“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由此引发的地方节度使不断扩大实力与野心的趋势却就此一发不可收拾，藩镇割据的形势由此形成。

唐肃宗、代宗时期，唐王朝对外面临着外族吐蕃势力不断增强的攻击压力，国防吃紧，为了增强国防，唐朝中央政权不得不依赖于地方节度使的实力。因此在此时期，朝廷基本上对节度使的割据采取姑息政策，助长了地方藩镇的嚣张气焰，叛乱不断发生。唐代宗大历十年（775），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作乱，军士疯狂掠夺数日；同年三月，陕州军乱，逐观察使李国清，纵兵大掠。此时，李翱四岁。到了唐德宗时期，朝廷力图平藩，否决了成德节度使李宝成之子李惟岳继袭节度使职位的要求，李惟岳遂与田承嗣之子田悦，卢龙节度使朱滔、王武俊联合叛唐。建中三年（782）十一月，朱滔、田悦、王武俊及李正己之子李纳皆自称王。后朱泚、李希烈皆自称帝，史称“二帝四王之乱”。面对叛军汹汹攻势，德宗如其先辈玄宗一样，被迫出逃长安。“二帝四王之乱”持续五年之久，至贞元二年（786）以德宗与藩镇妥协而告终。此乱在李翱十岁至十五岁时发生。李翱家乡汴州也是节度使变乱的重地，德宗贞元十年、十五年连续多次发生兵变，使李翱的生活也受到影响。从总体上看，可能中唐时期朝廷在对待藩镇割据时表现最佳的也就是唐宪宗了。他在元和年间主持了平定魏博、成德、淄青、淮西四大节度使叛乱战争，被称为“元和中兴”，尤其是由宰相裴度指挥的“平淮西”战争影响甚大，李翱的老师韩愈也曾亲自参战。不过，这种安定的局面持续时间并不长，唐宪宗死后不久，很快各地又重现割据叛乱局面。

宦官专权是中唐时期国家政治黑暗混乱的又一根源。中国古代社会自秦朝以后基本上实施的是皇权专制制度，皇帝为加强自己的权力，往往采取信任身边宦官来压制朝臣的办法。这使得宦官专权在整个秦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成为一个难以根除的痼疾，尤其以东汉、唐朝以及明朝为甚。唐朝的宦官专权始于唐肃宗时期。他任用宦官李辅国为亲信，将朝政弄得一团混乱，使国家由盛转衰。到了唐德宗时期，这种情况愈加严重。唐德宗为了制衡地方节度使，任命宦官为监军，到各地监视地方大员。到了贞元十二年（796），唐德宗更是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中尉，掌管了宫廷的禁卫部队。宦官权力日益坐大，掌握整个朝政大局，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操纵。其中，唐代宗、唐穆宗由宦官拥立，唐顺宗、唐敬宗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既由宦官拥立，又死于宦官之手。宦官专权引起了一部分有正义感的朝臣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以自己的力量与黑暗的政治进行对抗。

永贞年间（805），王伾、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准和程异等大臣辅助唐顺宗实行改革，打击腐败势力，削夺宦官权力，史称“永贞革新”。最终，宦官俱文珍勾结荆南节度使韦皋、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里应外合，逼迫顺宗退位，拥立太子李纯。随后，改革派遭受打击，王伾、王叔文遂被贬，王伾病逝，王叔文被贬后又赐死。其余八人被贬为偏远州郡的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835年，唐文宗太和九年，唐文宗和大臣李训、郑注策划剿灭宦官，以请当权宦官仇士良入宫看“甘露”为名，埋伏刀斧手进行刺杀。不过最后计划泄露，遭到宦官集团的疯狂报复。他们软禁唐文宗，杀害李训、郑注等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事变”。李翱的师弟皇甫湜即死于此次事变。在政治实践中的对抗连续被宦官镇压的情况下，仁人志士们用手中的笔表达愤

慨，针砭时弊。李翱好友柳宗元在被贬谪柳州期间，即写下名篇《捕蛇者说》，对皇室和宦官对民间疯狂搜刮的暴政进行鞭挞，发出了“苛政猛于虎也”的怒吼。李翱另一位好友白居易也写下了名篇《卖炭翁》，目标直指以为皇宫采办货物为借口强买强卖、欺压百姓的宦官。

除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之外，朝臣党争也是中唐政局混乱动荡的又一表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在朝廷举行的官员选拔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三人在考卷中直抒胸臆，批评时政，无所顾忌，被考官杨于陵、韦贯之评为上等，请求皇帝重用。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时任宰相李吉甫的利益。因为李吉甫本人是靠祖上荫护获得官职的，是世家大族势力的拥护者，也是考生们批评与针对的对象。于是李吉甫就私下向唐宪宗告状，说这几个被选中的考生本身就是考官杨于陵的亲戚。宪宗信以为真，就把主考官贬谪。牛僧孺等人长期充当藩镇幕僚，久不调用，是以开朋党斗争之序幕。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等进士为代表，李党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世家大族子弟为代表。牛、李两党各自依靠不同的宦官支持，在选官、科举、对外等问题上相互针对，不顾国家利益，加剧了政治局面的混乱。

李翱是望族后裔，又是进士出身，宦海沉浮几十年，在当时政治官场中交游广泛。因此，他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党争等时政大事都有切身体会。这些现实情况既影响到了李翱的经历，也影响到了李翱的政治主张，他自己的文章创作清晰体现出种种影响。

凋敝的经济财政

土地兼并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唐朝初年，政府实行均田制，把南北朝以来战乱中造成的大量无主荒

地分给无田耕种的流民百姓，同时又不触及地主们已经占有的土地。这样的措施在唐朝早期协调了各方利益，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与皇权地位的加强，占有大片土地的官僚、地主逐渐增多，土地兼并大量出现。唐玄宗开元末年和天宝年间以来，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相互攀比着吞并土地，置办田产，不把国家法律放在眼里。他们借着闹饥荒向有地农民放高利贷，然后夺其田产，使得老百姓无处安身。土地兼并的过程也就是均田制被破坏的过程。世家大族的庄田越来越大，他们虽坐拥万贯家财却可以不用交税。自耕农们田地狭小，几无立锥之地却要遭受国家不断加重的苛捐杂税。这就使得自耕农们不断破产，沦为大户人家的庄客、雇农。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赋税的征收难度，可是国家在官员俸禄、军费方面的财政支出却日益增加，这一进一退，就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基本陷入窘境，接近崩溃境地。

为了缓解财政难题，唐代的一些地方官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税收改革，如第五琦的榷盐法和刘宴的榷盐新法等。这些政策所采取的都是新开税源的措施，主要是增加了贸易税和盐税的征收。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极度紧张的局面，但治标不治本，土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更大的改革出现在唐德宗时期。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实施税法改革，废除过去的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即要求全国核定户籍人口财产，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财产征税，每年分夏秋两季交纳。

“两税法”按财产多少把税户分为九等，按户等纳税。其本质是用户税和地税为主要征税标准代替租庸调制下的以人口为征收标准。

两税法推行以后，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因为没有土地而租种他人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国家的税收来源，加强了中央的

经济力量，因为两税法规定无论主户、客户，均按田亩资产多寡交税，贵族官僚、富商地主都不得免除。不过，两税法的积极作用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在李翱成年以后的时代，统治者搜刮成性，又增添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名目，再加上当时农产品贬值的原因，广大农民还是不堪其重，生活愈加困苦。

佛、道的广泛传播与三教融合的趋势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充分发展，隋唐时期，佛教与道教两种宗教的传播达到空前鼎盛的高度。

由于皇族的支持，道教在唐代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李唐王朝的皇帝都以老子后裔自居，积极扶持道教，力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早在唐高祖时期，就确定了道先、儒次、佛末的三教次序，拟定了尊崇道教的方针。唐高宗又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以《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期，皇帝遣使搜访道经，纂修《道藏》，并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又命令两京、诸州修设玄远皇帝庙，并将《老子》《庄子》《列子》和《文子》等道家文献列为国子学学习的科目，每年以明经的类型参加科举考试。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唐代的道观增加迅速，达到1689所。到中唐时期，皇帝不仅崇奉道教，而且还沉溺于其中，他们信赖方士，服食仙丹，寄望成仙。唐文宗、武宗、宣宗都因服食丹药而死。连唐朝的公主也有出家当女道士的，如睿宗的金仙、玉真二公主，玄宗的新昌、永穆二公主等等。士大夫中间沉溺道教、服食丹药中毒而死的就更多，申请加入道教的也不少，著名诗人、集贤院学士贺知章也请度为道士，可见当时道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漫长演变，到唐代也已达到了传播的高峰，佛教力量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如同道教一样，佛教也得到君王的青

睐。唐高祖时期就在京城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即位后，拨巨资修建译经场，建立重要的寺刹。贞观年间的玄奘和尚，违法越境赴印度求法取经，回国后却受到“国宝”级待遇。唐太宗亲自接见，并为他提供优厚待遇，组织大规模译场，受他影响的达官贵人以及平民人数众多。武则天曾请高僧为其讲《华严经》。不空和尚在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任官，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唐宪宗曾下诏将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迎到皇宫里供奉。同时，佛教的寺院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佛时，拆毁的寺院达4600余所，佛教建筑40000余座，强迫僧尼还俗的达260500人，可见佛教在当时的盛行程度。

道教与佛教的大规模传播给中唐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从负面看，大量民众加入宗教，不从事劳动，减少了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同时，宗教寺观也掌握着不小的经济财产，却又不交赋税，这也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一部分知识分子沉溺于道、佛的世界而不能自拔，他们中间，有人是因倾慕佛教、道教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入教，有人是因对残酷现实失望而避入宗教，还有人是为了祈求长寿福禄而入教，总之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种浮躁、庸惫的情绪。从正面看，道教和佛教都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流派，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成就。唐代的道教涌现了一批思想家，在学术上也建树颇丰。司马承祯就撰有《坐忘论》《天隐子》；著名医学家、道教学者孙思邈曾注《老子》《庄子》；成玄英为《老子王弼注》和《庄子郭象注》作疏，影响都很大。佛教学者更是人才辈出，出现了著名的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四大宗派，流传久远。

面对宗教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泛滥局面，一部分有识之士奋起进行批判。他们不甘于这样的现状，在逆境下反思如何解决时代的矛盾，决心重振中华儒学的地位，收拾人心。在这种批

判中，三教文化得到进一步交流，知识分子们在重建儒学的过程中，也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观点，创造出了新的儒学思想成果。李翱正属于这批人中间的代表人物。

变化之中的文坛风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中唐以来的文坛也发生着巨变。这种变化主要包括两个运动，一个是诗歌的新乐府运动，另一个是文章写作的古文运动。

乐府本是西汉时期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人以机构为诗歌命名，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后来，一些诗人为了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便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出现了“新乐府”的诗歌。新乐府运动实际上从魏晋南北朝就兴起，到了中唐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大诗人李绅、元稹、张籍、白居易等进一步突破乐府诗歌的旧有规范限制，把目光投向更为基层的百姓生活，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思想深刻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

古文运动与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几乎同时进行。古文运动针对的是魏晋南北朝居于主体地位的骈体文。骈体文发展到唐朝时已经变得形式僵化，过于追求辞藻华丽，讲究声律、用典，对文章内容则不太重视，形成了萎靡的文风。它阻碍了思想的自由表达，严重束缚了文学的发展。于是一批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摒弃骈文，复兴先秦两汉古文写作的运动，名义上是复古，实际上却是要吸收古代散文的优点，创造出自由朴实、注重实际内容的新的文体，代替旧的骈体文章形式。古文运动虽是文学变革，其最核心的内容还是思想的变革，目的是要借文章的复古来达到儒学的复兴。

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主要人物以韩愈为旗手，包括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张籍等人。李翱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二、望族后裔

唐朝时期还是一个注重门第出身的时代，门第出身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翱在这方面具有什么优势与劣势？这些优势与劣势在其成长过程中又起到了哪些作用呢？我们要从他的出生开始说起。

何谓郡望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李翱出生于河南道汴州陈留县安丰乡（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一个门第显赫但家境贫寒的小地主家庭。这个家庭的情况听起来让人有些困惑，因为门第显赫与家境贫寒两个特点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这个奇怪的状况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先来看“门第显赫”。之所以李翱家可以称为“门第显赫”，主要在于他们家的“郡望”是“陇西李氏”。

要理解这个说法，必须先弄清楚“郡望”这个词的含义。“郡望”是中国姓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概念，它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指行政区划，意味着一个姓氏最初的祖籍所在地；而“望”指名门望族，意味着一个姓氏中比较显耀的宗族。“郡望”连用，即表示以某一地域作为祖籍的名门大族。“郡望”的出现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

“郡”这个称谓出现的历史原因就是人口的迁徙变动。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人口大量迁徙，各民族融合大大加强，人口的姓氏也随之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同一个姓的人口其祖先来历却各不相同，例如“刘”姓，既有原先的汉族人，也有改了姓的匈奴人。在这种情况下，单凭姓氏已经无法辨别血缘谱系的同异了。而人们普遍采取的就是“郡”+“姓氏”的

方法。“郡”即指某一个家族祖先最初居住的原籍。此一祖先如果后代人丁兴旺，自然会以几何级数不断发展壮大，从一家人发展为几家人，由几家人发展为几十家人，幸运者甚至会成为一个人口庞大的族群。在社会变动剧烈乃至兵荒马乱的条件下，不可能所有人都住在原籍，必然会四处迁徙。那么在迁徙过程中，各个分支人口则必须牢记自己祖先的原籍并世代延续。有了“郡”，则不管后来人口如何迁徙，来自同一个原籍的同姓族群总是可以辨别出来。这也算是中华民族注重“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一个传统。这一传统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在很多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那里得到良好的保存。

“望”这个称谓出现的历史原因就是魏晋以来门第观念的盛行。其最开始的源头在于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采取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顾名思义，就是将所要选拔的人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按照人才的品级来授予官职。那么区分人才品级的内容有哪些呢？主要有三个内容。第一是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这包括了父祖辈的资历，即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第二是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现在的品德评语。当时的总评一般都很简括，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第三是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但到了晋以后则反了过来，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原因很简单，因为有资格进行品评的上层官员基本上都出身于世家大族，为了本族利益，肯定会逐渐将家世设定为最重要的标准了。因此，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形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世代显贵的家族就成为了望族，为其他姓氏乃至同一姓氏的其他宗族所仰望。

唐时，“郡望”风俗已十分成熟，各个姓氏均有属于自己

的“郡望”。同时，门第观念依然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整个官僚系统的上层基本上仍由世家大族所把持，寒门庶族子弟颇难染指。有人统计过，有唐一代，担任过宰相的达数百人，而出身于寒门的只有贞观朝宰相马周一人，门第势力的强大，在当时可见一斑。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人都想办法在“郡望”上做文章，抓住“郡望”本身并不一定和某人的出生地相等的特点，纷纷选择门第更高者作为自己的“郡望”，不顾自己原来的籍贯，而听者也并无法考证，只能选择相信，一传十，十传百，一个寒门出身的人逐渐就变成了望族后裔。例如，李翱的老师韩愈就是典型代表。当时姓韩的人有四支郡望，“昌黎韩氏”“南阳韩氏”“颍川韩氏”和“陈留韩氏”。四支郡望中，“昌黎韩氏”和“南阳韩氏”的声望远强于另两支。尤其是“昌黎韩氏”（不是今河北昌黎，而是今辽宁凌源），在韩愈之前出过名相韩休（相玄宗）、韩滉（相德宗），声名显赫。故此韩愈就去依附，处处称自己为“昌黎韩愈”。久而久之，大家也都承认了这个身份，称他为“韩昌黎”。实际上他不仅没有出生于昌黎，也不是来自“昌黎韩氏”，而是“颍川韩氏”或“陈留韩氏”。

陇西李氏

不过与韩愈相比，李翱要幸运得多，因为他本身即出身于“陇西李氏”这个门第显耀的望族。“陇西李氏”即指发源于“陇西成纪”（在今甘肃省静宁县西南部）的李氏家族，属于当时全国最显耀的“五家七族”的重要成员——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据历史资料显示，李翱的这个出身是有据可查的，并非冒认名宗。《旧唐书》称李翱是“凉武昭王之后”，《新唐书》也称李翱“魏尚书左仆射（李）冲十世孙”，这两种说法都承认